



武漢文史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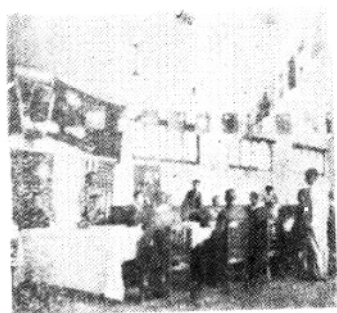
4

19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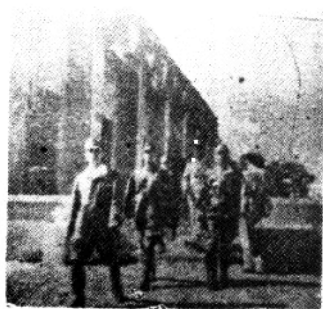
总第二十二辑



日寇投降后，汉口群众涌上街头欢庆胜利。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八日在汉口中山公园受降堂中，我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冈部直三郎在受降书上签字。



日军代表四人被摘除军刀后，步入受降堂。



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市社联、市历史学会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于八月十四日上午在汉口联合举行了报告会。右上为市委常委、市政协主席辛甫作重要讲话；左上由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巴南岗主持会场；右下为湖北财经学院副教授毛磊作关于武汉抗战的学术报告；左下为会场一瞥。

目 录

黄陂日军投降始末·····	彭光明 王安康 (1)
一支叛顽伪军策反记·····	许大鹏 (6)
在徐家棚拦击日舰的炮兵阵地上·····	湛先治 (34)
阳新保安队的一次抗日战斗·····	龙从启 (36)
威尔斯亲王号被炸前的破译战·····	鲍志鸿 (40)
苏联航空大队长艾罗申柯牺牲见闻·····	姜维翰 (42)
抗战中的十三军战地服务团·····	贡献之 (44)
我搞政工的一点经历·····	邢志洁 (54)
我所经办的检举汉奸、战犯案·····	吴 俊 (57)
沦陷时期的武汉教育·····	程 华 (68)
湖北省参议会的派别分歧与和平运动·····	吴先铭 (73)
武汉解放前的十人小组座谈会·····	段继李 (83)
汉口市参议员的选举·····	贺觉非 (87)
张弼川当选汉口市参议会议长内幕·····	周官文 (92)
汉口市改制特别市的经过·····	吕煥芬 (97)
胜利复员后的武汉文化界·····	肖海涵 (109)
联合国对汉口地区的儿童救济工作·····	李天泽 (114)
记李宗仁任代总统后的武汉之行·····	商若冰 (117)
鄂省府员工的反饥饿斗争·····	陈剑函 (121)
江岸铁路工人迎接解放军进城记·····	李新发 史玉明 (132)

新会计制度在湖北武汉推行历程·····	常樵生 程慕陶 (134)
真假金灵丹的斗争·····	王仲南 (144)
汉口社会服务处与社会公寓·····	杨春亭 (106)
相夫教子的革命老人——王德训·····	吴海涛 (151)
汉口大买办刘子敬的兴衰·····	董明藏 (158)
萧耀南和他的庄园·····	萧启华 (170)
感化院里的战斗·····	刘祖靖 (175)

XXXXXXXXXX
参考小资料
 XXXXXXXXXXXX

开罗会议·····	(120)
波茨坦会议·····	(183)
密苏里舰受降·····	(116)
南京受降仪式·····	(150)
双十协定·····	(91)
1986年《武汉文史资料》征订通知·····	(184)

黄陂日军投降始末

彭光明 王安康

日军“聆听”投降“诏书”以后	国民党接收与受降典礼
民主政府的纳降措施	战俘处置和肃奸工作

日军“聆听”投降“诏书”以后

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德、意法西斯已先后向盟国投降，“轴心国”已彻底解体，日本完全孤立。与此同时，我国人民军队已开展了战略性的大反攻，加之美军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和九日用原子弹分别轰炸了日本广岛、长崎，苏军也出师我国东北，一举歼灭了日本关东军，这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已陷入四面楚歌，水尽山穷的绝境。

八月十二日前后，日寇在黄陂的军政人员态度突变，凶焰大减，士气低落，闭营不出，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对此，当时饱受蹂躏的群众，既不明真相，也不知原委。八月十四日，黄陂日寇陆军独立第八十三旅团和日侨接到紧急通知后，全部集中到驻陂日军司令部广场（现县一中左侧）在一派森严肃穆的气氛中，全部双膝跪下地“聆听”日皇裕仁的重要广播讲话……这时日皇裕仁在广播中发表“御诏”，宣布日本完全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宣言》，命令全部日军从即日起，对盟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无条件投降。

当时战俘们神情沮丧，意志消沉，一扫昔日之威风。其中有

许多人想到战争结束了，可以活着回家，因而暗自庆幸，但也有个别军官受“军国主义”和“武士道精神”的影响很深，在听了投降广播以后，便面对东方剖腹自杀。

此后，日军处于紧张状态，并将日侨从居民区（现电影院附近）迁往军事区内喻家楼房中（现省汽校）居住，予以保护。并在军事区周围增岗添哨地加强警戒。大西门外和城内现粮食局以西一带的居民区则由伪军十一师负责维持社会秩序。

国民党接收与受降典礼

偏安在黄（红）安七里坪的国民党黄陂县政府，异常奔忙，打点文卷行装，窥视黄陂政局，谋划接收受降的措施。县长蔡谦星夜赶到宣化店与国民党县党部的书记长詹钧，彻夜密议接受事宜，一方面派人回陂联络，伺察动静，指派在县人员组织“善后委员会”，负责维护社会治安，防范新四军第五师先行纳降。一方面召集旅宣化店的有关人员，会商对日寇、汉奸的处理，以及乡镇区域的划分。准备就绪，于九月四日凌晨，蔡谦与县政府人员离七里坪，抵宿黄安二程乡公所。次日中午，由乡长派遣自卫队护送，一路上向解放区寻衅闹事，甚至杀害我根据地圣泉乡乡长韩寿樵和埠街乡指导员钟树华。他们行至大城潭秧鸡坡时，突然姚家集方向有密集的枪炮声，据报系我五师攻击日伪特工队前去接应蔡谦的马长青部。蔡谦不明情况，恐入埋伏，黄昏时又折回黄安县城。九月十一日，在黄安县自卫队的护送下，抵八里湾。九月十二日途经长轩岭、蔡家榨，沿鄂东公路直达县城，旋即解散善后委员会。

国民党第六战区急令第七十五军第六师赶忙进驻黄陂，实行军事管制，维持治安。而黄陂日军全部在黄陂猫耳山、青子铺、桃花庙一带集中，伪军十一师在任家大湾集中。九月二十二日在汪伪合作社大礼堂举行受降典礼，国民党政府派第六师师长林曦

祥任受降官，先由日寇旅团长率领僚属向受降官呈递投降书、指挥刀、旅团军旗、印信等物，并报告全旅团兵人数和武器装备等情况，然后下达解除日军武装的命令，所有日军放下一切武器，并后退五十步，紧接着国民党军队快步前进将日军武器装备全部收缴，并清点数目，接着又在任家大湾缴了伪军十一师的械，并进行了改编。

为了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当时还在黄陂城内仓库前面（现公安街六号仓库），举行了战利品展览会，将收缴日军的各种枪炮、军旗、军刀、电台、军用望远镜等公开陈列，让群众观看，参观者络绎不绝，人人兴高采烈，个个吐气扬眉。

民主政府的纳降措施

我根据地人民欣闻日寇投降后，欣喜若狂，人人奔走相告，村村鸣放鞭炮，有的乡还搭台唱戏，塔耳岗曾开万人庆祝大会欢呼抗日战争胜利。为了纳降，抗日民主政府县以下各级机关昼夜办公。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蒋介石曾电令：“所有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地驻防待令，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同时，派飞机到黄陂城乡遍撒传单，声称不准敌伪向我抗日武装投诚受降，对此，延安总部指示：命令各根据地部队赶紧向附近据点纳降，如果敌人负隅顽抗，就用军事手段解决，如果敌人自动投降，应该表示欢迎，给予优待。纳降工作从三方面进行：

一、积极争取敌伪人员；二、在根据地的交通沿线设纳降站，接待安置投降人员；三、用白布缝两个袋子，一个装糖果花生，一个装《纳降书》和宣传品，既慰藉，又教育。

日伪军除在黄陂城关驻有部队外，在我县甘棠铺、靠山店、六指店、任家大湾等地也都有驻军，于是我方工作人员一方面通过当地的维持会、保公所（是两面政权机构，表面为日伪做事，实际为我方工作），将慰问袋，挂在敌人据点周围铁丝网上，宣传我

方纳降的道理和指明日伪军的前途出路。不久有一个姓胡的、绰号叫“瞎胡闹”的伪军中队长受到了纳降教育，思想有所转变，当地政府胡家楼子、潘家祠堂里备酒一席，约胡前来会谈，武装干部工作队教导员刘浩、队长张威亲自接见，晓以大义，当场将胡的思想工作做好，然后发给胡的委任状，任胡为我方大队长之职，并嘱胡在约定时间、地点把全中队人员武装带过来。由于我方纳降工作开展得深入、细致，所以邻近解放区的日伪驻军，纷纷携械来降。

与此同时，国民党的十一师开到我根据地周围，西边在姚家集、十棵松、泊沫港、长轩岭、大城潭、李家集、研子岗、横山一带驻扎。东边在石港、王家河、什仔铺、骆驼铺、甘棠铺、凤凰寨、长岭岗一带驻扎。名义上是接收日伪投降，实际上是包围根据地，抢夺老百姓的东西，群众痛恨地称他们的“接收”为“劫收”。原打着“国共合作”旗号的投机豪绅，亦因此改变了嘴脸。前边区参议员胡康民、余笙阶（士绅）等均暗中破坏根据地的纳降工作，如日寇投降后不久，蒋军来不及赶来接收，驻武汉的汪伪十四军军长邹平凡，所辖数万人，打算全军投奔我五师，意欲通过胡康民的关系予以引荐，而胡却要邹平凡“吊颈寻大树”，去投国民党，结果该军“弃明投暗”了。显然，由国民党当局策划的一场图谋抢夺地盘、制造磨擦的危机正在酝酿和形成。

战俘处置和肃奸工作

当时黄陂国民党军政联合办公室，通知战俘营每天派一中队（相当一个连）战俘，轮流到黄陂城关打扫街道，清除垃圾。这时日俘个个俯首贴耳，唯命是从、与昔日横行霸道，凶神恶煞相比，真有天渊之别。

这时我苏区人民在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认真执行《日内瓦公约》，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对广大战俘不杀不辱，

仅对个别战争罪犯依法逮捕，进行审判。人民群众虽然对日军侵略家乡之暴行恨之入骨，然而我中华民族乃仁义之邦，对日本战俘遵守《日内瓦公约》之精神，未给予虐待。仅少数青年农民由于国恨家仇难消，加之年轻气盛，拿着锄头等物，要痛击战俘，但我民主政府的党政工作人员大力宣传党的有关优待俘虏的政策，并及时予以教育、劝导、制止。

按当时的规定，战俘都有一定的生活待遇，但由于国民党官僚层层克扣，贪污中饱，发到战俘手中的却寥寥无几，这样也就让这些昔日吃鱼吃肉吃罐头的“日本皇军”，饱赏到了饿肚子的滋味了。战俘们为了填满肚子，就自愿到附近农户请求帮工，并提出做工只吃饭，不要钱。有些劳力不足的农户就叫他们帮工，战俘们专拣挑大粪、挑草头、舂米、推磨等重活干，干得还顶卖力，顾主也较满意，给他们较多的吃食，战俘们就狼吞虎咽、大吃大喝，感恩不尽。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黄陂日俘按照统筹安排，到武汉乘船至上海崇明岛等待，然后由海运送回日，让这些战俘生还故土，和家人团聚。

至于那些认贼作父的汉奸走狗，在日本投降后，十分惊慌。除了几个臭名昭著民愤极大连国民党当局也不敢袒护者，如伪县长程汉卿、伪宪兵特工大队长余斌、伪合作社长邓淦初等逮捕归案外，许多汉奸为图幸存，竟不惜万金四出运动，八方通融，或摇身一变谓之“地下工作人员”有之；或投靠达官显贵仍享高官厚禄者有之；或拥兵自卫妄图朝野收编者有之；或削发为僧及迁地而居逃避世人耳目者亦有之，可怜蛆虫，纷纷钻营变色，逍遥法外者大有人在。

（黄陂县政协供稿）

一支叛顽伪军策反记

许 大 鹏

奇特的合作 受编不受调 变统战为策反 欲速则不达 在反复的日子
里 柳暗花明 假戏真演和真戏假唱 箭在弦上 破釜沉舟 江汉惊雷

武汉沦陷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三日深夜，按照鄂豫边区党委和天（门）汉（川）地委的部署，我们十几个共产党员，率领一支经过长期策反工作反复多次的部队——汪伪“和平救国军”第八十二师一六五旅和一六四旅一个团，开拔到汉阳县的丁家集，会见了事先等候在那里的新四军鄂豫边区挺进纵队参谋长张执一同志，将这支部队交给了党。

几天后，部队开到了汉江湖畔的朝家庙。李先念司令员特地从京山小花岭司令部赶来，在隆重的欢迎大会上，他亲自代表鄂豫边区党委和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司令部，把一面“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第四支队”的光荣军旗授给了我们。

这支部队是怎样经过长期策反后，才投向党和人民怀抱的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奇 特 的 合 作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寇进逼武汉，国民党军政首脑纷纷西迁。中共武昌县委通知各乡党组织和县委委员要丢掉对国民党政府的任何幻想，依靠我党各乡地下组织的力量，迅速以抗日乡村工

作促进会的可靠成员，积极分子为基础，组织成立抗日游击武装。县委决定各乡抗日武装成立起来后，全部集中到县南梁子湖畔的保福祠，以便合并整编。

我是在武汉沦陷后的半个月左右，奉命来到县南乡的保福祠的。没多久，我感染了痢疾，一天拉十几遍，县委批准我回流芳岭老家治病。在家养病期间，听说国民党军队溃退时在公路两旁塘堰水沟里，丢了不少枪支、弹药，一部分被大胆的群众拣回去藏在家里，一部分仍然躺在塘堰水沟里。我就动员乡促会积极分子说服群众把拾走的枪支、弹药拿出来抗日，并组织几个小组寻找、摸捞，总共搞到了三十多条枪，还有一支左轮手枪，一挺轻机枪，子弹千余发。于是我们依靠这些武器，组织起了一支拥有四十多人枪的小股抗日游击队。

与此同时，流芳岭的著名士绅黄人杰，依仗势大财多，可以出条子向地方摊派“救国捐”。他拿出现大洋购买枪支、弹药，三、五块银元一支枪，一、二十块银元一挺机枪。在短短的时间内，也拉起了两百多人枪的队伍。黄人杰听说我回来了，还搞起了几十人条枪的队伍，派人通知我与他会面，想和我合作。黄人杰祖宗几代都是秀才，是书香人家，家里有十几石田，在流芳岭比较出名，是地方当权派，有号召力。大革命时期，他随着革命洪流参加了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流芳岭地主阶级成立了一支地主武装团防营，装备十一条新汉阳造步枪，一千多发子弹，当时我父亲许保民是地下党区委书记，很想把这些枪、弹搞到手，拉起一支红军游击队到梁子湖畔打游击。恰逢这个团防营的头子孙斌臣七十多岁了，年纪老，身体衰，不想搞了。地方士绅们就说选。这样，我父亲就在流芳岭舒、田、周、刘四大姓中积极活动，使黄人杰当选上了团总。谁知他当上团总后就变卦了，见异思迁，随波逐流，不服从党的指示。党组织决定开除他的党籍，还没有来得及宣布，党内出了叛徒，黄人杰被国民党抓去坐了四年牢。后

由他的舅父、老同盟会员杨经曲设法救了出来。从此他消极了一段时间。抗日战争兴起后黄人杰想出来抗日，我父亲表示欢迎。他提出恢复党组织关系，我父亲没有同意。武汉沦陷后，黄人杰也去过保福祠。由于他不是党员，没有安排他担任什么职务。黄人杰看到党组织不大重视他，已经是闷闷不乐。再加上党内某些同志政策水平不高，还不太懂得如何团结当地代表人物。县委书记王健民看着黄人杰腰里别着蓝光闪闪的二八盒子眼红，硬是设法搞丢了。黄人杰气得两眼冒火，把袖子一甩说：“大鹏呀，我要走了。这些人要枪不要朋友，我不和他们搞了。”他一气之下，就在我患病之先回到了流芳岭，拖起了本地两百多枪兵的队伍。

我和黄人杰会面后，双方交换了意见，他首先提出把这两支队伍合起来，合作抗日，他之所提出合作，目的很明显的，他虽然拖起了这两百人的队伍，但大部分是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是些乌合之众，没有一个可靠的懂得军事的帮手。他知道我打过游击，懂军事，想我和他合伙带兵作他的帮手，把这支队伍巩固起来，以图发展。我当时认为黄人杰虽然被开除了党籍，但被捕后没有做坏事，又是地方上有影响的人物，是统战对象，和他合作，设法把这支队伍控制起来，引向正道，可以增添党和人民的抗日力量。

就在这时，党的武昌县委也在保福祠拉起了一支抗日武装。听说有两百多人枪，接受了国民党地方部队的番号，称“湖北省保安司令部直辖国民自卫队第一大队”，简称“梁湖大队”。县委来信要我把组织起来的四十多条人枪带到保福祠，并任命我为中队长。当时我真左右为难。县委要我去我不能说不去，我手中的枪兵是可以带走的，但黄人杰手下的枪兵是带不过去的。为了那支二八盒子，黄人杰一直耿耿于怀。我这一走，这两百多人枪不是争取不过来了吗？考虑再三，心里面舍不得放弃这两百多人枪，就托人带信给县委，申述我的看法和打算，并请求组织上派得力的干部来掌握这两、三百人枪的队伍。可是，个把多月过去了，一直

未得到县委的答复。时间不等人，一九三九年春节，我和黄人杰的这两支队伍合作了，自称“鄂南人民抗日自卫总队”。黄人杰任总队长，下辖四个中队，我当了第一中队中队长。黄人杰在地方有号召力，保甲长都听他的，条子一出，救国捐就摊派下去了。我懂得军事，在党内和进步群众中有影响，没有好久，我们的队伍一下子发展到四百多人枪。

“受编不受调”

自从我托人带信给县委后，一直没有回信。我和黄人杰合作后，又写信向县委汇报了情况，仍未得到答复。后来听说县委对我的“先斩后奏”很有意见，批评我不听县委的指示，跟着黄人杰跑，还准备开除我的党籍。为了消除党对我的误解，我又赶紧写第二封信向县委详细汇报了我的观点、打算。后来，有人向县委反映了我的真实情况后，县委终于消除了对我的误解，重视了我的意见，并研究决定，同意我不回保福祠，并派来以县委宣传部长舒江皋同志为首的好几位党员，我记得有潘斌、沈池麟、蒋鹏武等人，参加搞部队的兵运工作，以便进一步掌握这支队伍。

舒江皋同志和我交换了情况之后，着重讨论了如何消除县委与黄人杰之间的隔阂，统一抗日。先由我去试探黄人杰的口风，然后相机行事。

我来到总队部，试探着对黄人杰说：“黄先生，你听说了吗？县委在保福祠那边成立了梁湖大队，有两百多条人枪，还和日本入干了几仗，在梁子湖畔的保福祠、陈家祠一带建立了一小块根据地，初步打开了局面。”

黄人杰听后颇为自满地说：“他们拉了两百多人枪，我们搞了四百多人枪，混得不比他们差。”

我接着说：“现在武汉日本人势力很大，抗日的力量各搞各，终不是个长远之计。我看，他们有两百多条枪，我们这边也

有几百条枪，还是和保福祠县委王健明、舒江皋他们搞到一堆好，团结起来力量大。”

黄人杰有些反感地说：“算了吧，我才不缠他们呢？”我又进一步说：“不能那样看人，一切为了抗日嘛。同时，我们不是靠哪个人，而是靠阶级。你是老同志了，心胸应该放宽一些。不然的话，这样憋下去，彼此不合作，就有可能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彼此合作抗日，他们一大队，我们二大队，互相联系，有个什么急事也可以相互支援。流芳岭背靠汤孙湖，地区狭小，没有回旋余地。如果敌人从武汉出来扫荡，我们没有退路，想转移也没有个位置。你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黄人杰听到这里不做声了，象是在考虑利害关系。

我一看有门了，就趁势说，“江皋来了，他很关心我们。别人主动找上我们的门，讲团结。是不是见见面，谈一谈？”

舒江皋也是流芳岭人，黄人杰的好友，黄人杰高兴了，站起来说：“好！他来了，接他吃餐饭，当面谈一谈也可以。”

我没有料到，一席话竟把黄人杰说动了。

酒席上，经过舒江皋的说服工作，黄人杰终于同意接受县委的编制，但却提出了一个条件：“团结抗日可以，人归我管，受编不受调。”舒江皋看到合并的条件还不成熟，先达到这一步就算不错，也就爽快地答应了黄人杰提出的条件。

又经过几天协商，黄人杰这支部队取消自封的“鄂南人民抗日总队”的番号，改编为“湖北省保安司令部直辖国民自卫队第二大队”，简称梁湖二大队，属武昌县委领导，黄人杰任大队长，舒江皋任大队教导员，潘斌任大队副，我仍任一中队中队长，沈池麟派到我这个中队当指导员，蒋鹏武当第五中队中队长。部队由黄人杰掌握，受编不受调。

经过初步整顿，黄人杰的部队一、五两个中队由共产党员掌

握控制。其他中队下面班排里也发展了少数的共产党员。舒江皋同志后来把党员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些党小组，加紧了开展兵运工作的第一步。

这支部队后来发展到九个中队。马湖的胡杰山的一百多条人枪也过来了，加入了这支部队，使部队一下子扩充到千把人，七百多条枪，二十几挺机枪，成为武汉外围举足轻重的一支抗日武装力量。

变统战为策反

正当党在黄人杰部队兵运工作有了初步基础的时候，局势却急转直下。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严重威胁着敌人。日寇改变了对华的作战方针，用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办法对付国民党，以主要兵力对付共产党领导的敌后人民抗日力量。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则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一九三九年夏，就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六月，“平江惨案”发生了。一时反共叫嚣，不翼而飞。我党在黄部虽然派进了几个党员干部，但不能左右黄人杰的政治方向。这时，黄人杰在国顽和日伪东挤西压，威迫利诱之下，左遮右挡，招架不迭，领着部队流动于流芳岭、五里界、覃公庙、豹子湖，梁子湖一带，日子不好过。他开始动摇了，首先在国民党政府鄂南专员李辉那里受编，弄了块“鄂南保安司令部直属独立团”的招牌，他自己则当了团长，黄人杰这时还是脚踏两只船。他向我们解释说：“么办呢？为了解决军饷，为了求得生存，我在李辉那里讲的条件也是‘受编不受调。’暗里，我仍然接受武昌县委领导。”

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黄人杰的舅父杨经世，也是流芳岭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黄人杰被捕坐牢，是他营救出来的。他既是黄人杰的

长辈，又是黄人杰的救命恩人。黄人杰对他是感恩肺腑，言必听，计必从。杨年轻时加入过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和董必武同志有过交往。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大革命时当过湖北省财政厅秘书，后来又当过几任县长，在武昌是有较高的声望。抗日战争兴起后，一度受我党邀请，出面与我党派出的张执一同志一起主持过党领导的外围群众组织“湖北省乡村工作促进会”的工作，有一定正义感，脑子灵活，善于适应环境。他的口头禅是“自古难逃春秋笔，人生一世当留名”“识时务者为俊杰”。

杨经曲的熟人中有两个国民党高级官员，一个叫金龙章，一个叫汪步青。在汪精卫投降日寇，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影响下，金龙章、汪步青先后投敌卖国，当了汉奸。金龙章是皇协军的总司令，汪步青是汪伪和平救国军第八十二师师长。这两支伪军都驻扎在武汉外围。杨经曲看到黄人杰部队在国顽、日伪夹缝中，处境困难，就帮助黄人杰于一九三九年夏投到皇协军总司令金龙章部下，编为“皇协军鄂南独立旅”，黄任旅长。黄人杰在突然公开这一叛变行为时，还公开宣布，脱离我武昌县委领导，断绝任何联系。

黄人杰这一叛变行为，遭到我党在黄部的党员和许多爱国士兵的强烈不满和反对。教导员舒江皋，大队副潘斌，一中队指导员沈池麟等在一个深夜带着一中队的一个排不辞而别，只有我和五中队长蒋鹏武等上十几个党员留下来了。

眼看着党影响和组织起来的千把人枪的武装部队，将要投到敌伪的怀抱，成为敌人的鹰犬，我内心十分焦急。我抓住黄人杰叛国投敌的事实，和他辩论，黄人杰理屈词穷，说：“我只是借屋躲雨，不当汉奸。我把队伍开到‘三不搭边’，（指日伪、国顽、我军）汉阳去，摆脱他们的控制，争取独立生存。大鹏，我们还是一起干吧。”